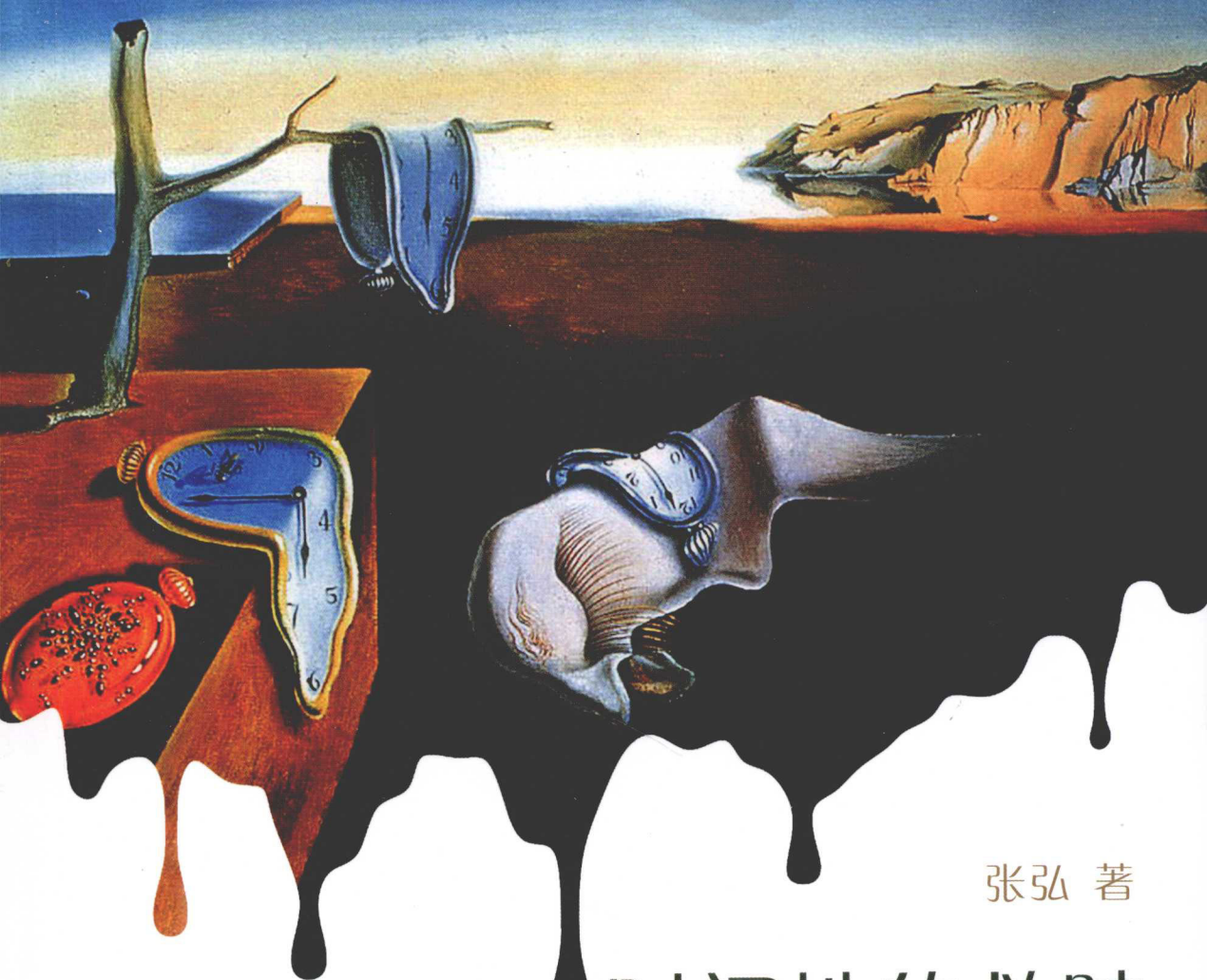




张弘 著

时间性的救赎

2000-2011学术文化论集

Rescuing the Temporariness

上海遠東出版社



张弘 著

时间性的救赎

2000-2011 学术文化论集

Rescuing the Temporariness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性的救赎:2000~2011 学术文化论集/张弘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
ISBN 978-7-5476-0713-8

I. ①时… II. ①张… III. ①文化理论—文集
IV. ①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5544 号

责任编辑:刘丽娟
封面设计:张晶灵

时间性的救赎 2000—2011 学术文化论集

著者:张弘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200235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字数:383 千字
印张:22 插页 1

ISBN 978-7-5476-0713-8/G·514 定价:5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38

前言

这一论集，收入笔者 2000 至 2011 年有关学术与文化的各体文章，是又一阶段的研究与思想成果的反映。题为《时间性的救赎》，首先“时间性”需要解释一下。如按通常说法讲“时间”，不会没人懂，但却容易陷入流俗之见，即把时间理解为外在于人的一个度量刻度，似乎那就是我们身外的挂钟、手表、形形色色的计时器和显时器，以及日历、月历、万年历等等。但其实，时间是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人人都生存在时间的维度内。即使没有那些外在的刻度标志，时间也在我们身上发生、经过和流逝。如果说，空间的变动离不开外在的座标，时间则无须它们自行进行。当下即成过往，瞬间已似千年，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里的人物，砸碎了手表想叫时间停止，结果绝望地发现那是徒劳，就是极佳的描写。时间这一种无法改变的内在于人的属性，就是时间性。换用哲学的术语，时间性即此在的根本属性。这一点，是海德格尔通过《存在与时间》这部巨著深刻地揭示的。

在我看来，要说人类有什么原罪的话，那就是对时间性的习焉不察，一系列问题也由此而来。最简单的例子，见于人生态度。人们不明白由于时间性，人实际是“向死而生”，因此无法正确对待死亡，恋生怕死。古之统治者倾一国之物力人力，企求万岁长生，劳民伤财；今之老百姓迷信这种保健药那种抗老素，不仅浪费资源，往往反而戕害健康。连类而及，负面的影响进而也积淀在文化与观念中。像历史上的道教，汉代开始逐渐蜕变为企求长生不老之术，很早即掌握的化学知识只用于炼丹，明代中叶后的矿业由宦官掌握，更只知为宫廷提供炼制长生不老丹的原材料，不懂得用于推动工商产业的发展。而今天，“年轻即美”不知不觉成了普遍的审美标准，整容、染发、塑体……不单蔚为风尚，也催生了相关产业。

在更大的视野中，时间性涉及更重要的问题现代性。后者称得上是世纪之

交中国学界的一个热点,实际也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张力的凝聚。何为现代性?概括而言,无非是现代化过程里产生的问题及其应对方案。然而,无论现代的划界、现代化目标的规划、规划的实施及其后果,还是对这些后果(包括正负两方面)的认识及后续举措,均深受时间性约束。简要地说,我们规定的现代,及其中暗指的将来,都隐含着过去及同这个过去的关系,那甚至不一定是自觉的看法,而仅是无意识的直觉。唯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准确地把握现实中发生的问题,找到解决的途径。否则,继续陷于时间性的盲区,而想走出当前的困惑,无异盲人瞎马,结果只能是一次次挫折。

时间性就这样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集中有的论文就是专门从哲理层面对此进行探讨的。在中国,因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像这样的从理论根基出发的反思是匮乏的。由于同样步入了现代化的进程,我们也接过了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话语,但往往不加分析地沿用与套用,照着别人重复些现成的结论,或不明就里地当做时髦的花絮,只为显示思想没有落伍。正是此种状况,反衬出深层理论探究之必须。

时间性的提出也为学术研究敞开了新的前景。对此,这里不多谈,只引论集中谈史学的片断为例——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历史,一方面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和事实,此乃事物历时发生的实际进程;另一方面则是后来对过去发生过的事件和事实的追忆、记叙和重构,这样的行为应归入历史学的范畴,不该和事物实际进程混为一谈。二者是在时间维度内发生的双向逆反运动,曾发生的事件和事实时时刻刻远离现在,而追忆等表象行为也随着时间的进行越来越落入未来之境。人们在现象中追忆、记叙和重构过去的事件和事实时,虽力求再现当时的真实(实证主义史学观突出体现了这样的追求),却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唯有不断的近真与逼真。在此过程里,折射出来的其实是早就有当事人主观视域参与其中的图景,同时还要加上不断掺入的后来者的阐释视界。历史的真实,尤其当指涉的是人们叙述或复原的历史真实时,只可能是这样历时变动而交织的现象过程。

……似乎……今天的某些史学家还能有资格宣布自己的发现为唯一的真实。但实际情况是,有人信以为真的历史复原图,永远只可能是已湮没的过去事实,与并不完整且有倾向性的记叙,加上现下和后来各时段的阐释及想象的扭结体与镶嵌物。史学家笔下所谓的历史真实,说到底就是这样—一个复合的混成。今后的历史科学,应该直面这一事实,致力于研讨

这一复合混成结果的成分与组合,探究其形成和演变的原因,剖析它的社会机制和功能作用,而放弃那种完整再现过去事件的奢望。(本书 319 页)

对时间性的体悟,固然是受海德格尔的启示,但主要出于我本人一直以来对动态观和现象学方法的主张与坚持。在先后推出的一系列论著(包括专著)中,我都表明了这样一种基本的思想立场:反对将纳入研究范围的事物进行静态的或固态的实体化,也反对将人对事物的认知绝对化。不妨概而言之:以心观物时,不单物动,心亦动。而物动与心动之根据,即在时间性。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时间性乃是动态观和现象学方法的哲理起点,也是它的基点。

在这里,如果我要自诩“吾道一以贯之”,可能有点夸大,但除了理论的阐发,在相关的个例解剖与具体分析中,包括有关学科建设方向的讨论,确实均程度不同地始终如一地体现了上述思想立场。论集中文章具在,可以参阅。与此同时,从时间性和现代性出发,也对耳闻目睹的种种文化现象进行了评论,那些恰好是发生在身边的现代化进程的活生生表征。说到文化,诚然是世纪之交最引人注目也最招人议论的话题,但同样有不同观点与方法论的交错,包括静态观与动态观、对象论与现象学的对垒。在这方面,我依旧坚持批判的精神,并愿意根据康德的话再重复一遍:批判只意味着把一切带上“理性的法庭”,包括批判自身在内。

就这样,通过探究和反思,也通过批判,试图从时间性的盲区救赎出来,也从现代性与文化的迷途里救赎出来,成为贯穿本论集的一大主线。倒不是陆陆续续写作时有如此明确的规划,只不过近十余年的问题意识的关注点集中于此,哪怕在涉猎不同领域时也不例外,所以不知不觉地就形成了焦点。当然,我自己思想的轨道及其达到的域界,并不奢望别人都能够认同甚或追随,只为着标志求索而行的路径,并看看究竟是否进入了真理前沿。这也是我把又一时间段的长短文章收录在一起,公开出版的缘由之一。

记得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结尾处写下过一段话,大意为时间无情地淘汰了许许多多,但正是经过这样的淘汰,珍贵的有价值的东西才得以留存在记忆里。相信救赎的作用其实类似。一旦把时间性从“天道不变”的盲区救赎出来,同时也就救赎了“在在不住”的我们的自在。

目 录

前言	1
----	---

上卷 文化精神与文学审美

第一编 现代性和学术文化

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反思——兼论当代中国的精神重建问题	4
时间性分析：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点考察	14
海德格尔的时间性观念与现代性问题	26
“纯学术”与中国学术的现代性	35
中国现代学术：品位提升与境界开拓	38
学术范式转型与批判意识	42
知识分子问题：现实状况与话语体系	47
从历时视域看儒学在现代语境中的重构	56
论吴宓思想的体系性及其“一多”观念	67

第二编 文学审美中的文化

试论《尤利西斯》的父与子主题和文化间性	79
《杜伊诺哀歌》及其他——关于里尔克的读解	94
中美文化关系研究的一种模式——以赫西的小说《召唤》为个例	108
再回首：中俄文学之交的审视与展望	119
外国文学研究中哲理意蕴的探讨	123

[附录] 从《金刚经》和《红楼梦》看文学与宗教的分野	132
从多丽丝·莱辛获诺贝尔文学奖想到的	137
除了隔膜,还有什么?——也说缪勒的得奖及其他	139
论吴宓的古体诗写作	142

第三编 文化和学科建设

全球化语境的反思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当下使命	156
中国比较文学的现代语境与危机问题	166
现代意识观照下的可比性问题	177
也谈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新问题	186
近三十年中国美学史专著中的若干问题	196
“文化儒学”:当代儒学新的发展空间——兼评“人文儒学”与“后儒学”	211

下卷 文化批判与反思

第四编 文化立场的基准

文化的自觉	228
文化的理想	230
文化的世纪	232
原住民:文化传统问题的突现	234
文化教育与实用主义	236
开放的态度	239
追星现象与偶像崇拜	242
知识社会之种种	247
“审美文化”的尴尬	250
上海文化:断层上的重造	253

第五编 文化现象透析

小议“身体性”	257
从文化研究视角看《无极》之争	260

网络风云与“文化批判”	263
全民作秀的时代?	266
教师节的悲哀	269
慈善捐助那点事	271
抄袭与学术复制	273
周立波:不止一代人需要的文化回忆	276
大师,在公共知识分子的喧嚣中离去	280
生命中应当感谢谁?	283

第六编 守望文化家园

质疑“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倡议	287
从概念到概念的讹误	290
“有机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翻译问题	292
学术真理、政治正确与个人是非——小评“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重开争端	297
[附录] 论“费厄泼赖”应该立行	299
在“纪念”的名义下——评一篇关于吴宓诞辰 110 周年的文章	305
以最热切的真诚	311
你好!《圣路易》	313
[附录] 新的史学观——读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316
如何成就文化大国才是问题关键	320
谁是发现李白生于碎叶的第一人?	325
读《天父下凡诏书》	327
诗,不在乎冷落	332
常怀敬畏之心	334
[附录] 敬畏自然——日本大海啸静思录	336

后记	338
----	-----

上卷

文化精神与文学审美

第一编
现代性和学术文化

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反思

——兼论当代中国的精神重建问题

(一)

在对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进行的反思中,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①一书提出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无论在方法或具体结论上都是影响较大的。“中国中心观”明显针对着西方中心主义,其民族主义与地域主义视角就像它的对立面,同样毫不含糊。涉及现代化问题时,西方中心主义通常站在西方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现代意识的觉醒,把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社会转型归结为西方外来力量的功劳,把中国现代意识的思想资源追溯到西方的理论学说。相反,“中国中心观”将视角转到中国自身,根据本土的因素来说明这些情况,还尽量用中国内在固有的、而不是西方外来输入的学说、见解和价值标准,来评价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里的重大事件或文化现象。

“中国中心观”于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后,改变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在此之前,西方汉学界习惯以“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发端,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面对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冲击而作出的一种反应,我们在费正清、列文森、芮玛丽等早一代汉学家的著述里读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倾向。而在此之后,则强调“现代”无非是“传统”的自然延伸,强调二者的互相渗透与不可分离,认为现代化对中国而言乃是它自身内在活力的必由途径,后一模式的代表有史华慈、张灏、萧公权、保罗·柯文等人的著作^②。林毓生的观点也在上世纪末传入中国大陆,一部分大陆学者接受了他的观点并有所发挥。

^① Yu-sheng Lin,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② 详见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单凭本土的内在活力究竟能否启动并走上轨道?我们认为,对此问题的正确回答,既不取决于观察视角或研究途径的颠倒,也不能依赖从某个理论范式出发的演绎或推衍,而要根据历史的事实。

所谓中国自身的内在活力,首先是指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因素。这个问题 20 世纪 60 年代国内学界就有过研究与讨论,以邓拓、傅衣凌等人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明代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阶段。这一观点无疑能够为主要从文献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方面立论的林毓生提供支持,但它本身却有一个为人忽略的重大缺陷,即只注意到经济因素而忽略了文化因素。

我们知道,明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通过丝绸与瓷器的对外贸易,白银贮藏量占世界第一位。当时中国已经具备了开发现代产业所需要的大量资金,那是西方国家在随后的岁月里需要靠殖民掠夺、战争赔款、剥夺一部分国民等血腥的原始积累手段才能聚敛起来的。但中国并没有合逻辑地走上发展现代产业的道路,关键就在文化因素的制约。在这方面,郑和下西洋可以作为典型事例来进行剖析。

据历史学家研究,明初江南经济的发展水平,已到了需要对外拓展市场的程度,民间在设法扩大对外贸易,东南亚的海外市场引起广泛关注。当时文人著述中涉及东南亚地区及其文化的内容不在少数,话本小说里也有所反映和描写。这时期泉州曾是最大的对外港口,那里至今还留有巨大海船的遗骸。明初统治者如明成祖也看到了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不惜与民争利,企图由朝廷独占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就在此动机下成行。郑和奉命率领由六十多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先后七次远航东南亚,名义上有搜寻在帝位之争中失败而逃亡的建文帝的成分,实际是考察有关情形,以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及东非的经济贸易及政治上的联系。永乐三年(1405)首航,永乐五年(1407)郑和返程后,朝廷就设立了四夷馆,隶属在翰林院下,教授各国外语,培养翻译人材。这反映了当时实际的需要和朝廷的重视,反过来也促进了和东南亚各国的海外贸易。当时中国对东南亚的航海通道相当熟悉和有把握。郑和所用的航海图(收在茅元仪辑《武备志》中)包括印度洋海域的航线在内,均十分精确。

无疑这是中国发展的重大契机。然而,到了明宣宗继位的宣德年间,即 15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葡萄牙、荷兰殖民者的海上势力侵入东南亚沿海,明王朝的海上霸权受到了严重挑战。但朝廷的对策不是加强战备,而是下令严禁“下海通番”,采取隔离的政策。在此情况下,郑和在宣德六年(1431)的最后一次下

西洋(其余均在永乐朝)自然成了强弩之末。第三年郑和在返程病死(另一说回国后死在南京),于是这一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达伽马发现绕好望角的东方航线都早了半个世纪的壮举,就这样偃旗息鼓,仅留下一段辉煌的史话,而不像后两者替西方世界打开了攫取海外资源与广大市场的通途,直接推动了接踵而至的产业现代化。

有意思的是,郑和下西洋在明代士大夫的记忆中很快就变成了不堪回首的梦魇。史料记载,成化年间(15世纪后期),明宪宗有旨咨访下西洋故事,郑和七下西洋的档案材料原存兵部职方司,但时任职方郎中的刘宗宪公(名待考),以为其事劳民伤财,不合国体,不宜再行仿效,干脆将有关档案取来焚毁,皇帝的咨询也就没了下文。(事见顾起元《客座赘语·宝船》)不仅重开海外贸易的事不了了之,连有关资料都被破坏殆尽。明朝廷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情况,后世只能见到转录在《明实录》里的一小部分内容^①。

这是为什么?只能从文化上获得解释。中国虽然也有辽阔的海岸线,但广袤的领土、充沛的资源决定了它所孕育的是大陆型文明,其基本生存方式是守土蕃育而非开拓殖民。如果换了海洋型的文明,那么当它的制海权受到挑战时,唯一的反应只有强化海上的防卫力量与抗御能力以应对事变。按照当时的实力,明朝完全有条件将其庞大的商船队改装成舰队,来对付葡萄牙、荷兰及随后西班牙的海盗船。但明朝退缩了,而且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不值得与之一较高下,甚至任何想要重新一试的念头都绝对要不得。这是因为朝廷感到自己的命脉系于中国这片黄土地,所以无须再耗费任何一点精力,去同四夷的蕞尔小邦争夺海外缥缈不定的蜗角之利。

明朝廷的这种退缩与隔离的政策无形中鼓励了西方殖民者更猖狂无忌地侵夺东南亚的势力范围。万历二十一年(1593)和三十一年(1603)及崇祯十二年(1639),西班牙殖民者三次在吕宋(今菲律宾)屠杀华侨,但明朝政府仍一无作为,结果极大地遏制了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浪潮,也削弱了在那里的对华贸易与市场拓展。当然,明代中叶起内政问题较多,一个个皇帝贪图长生不老,躲进深宫修道炼丹,不理朝政,导致大臣与宦官专权,引发一系列危机。但最高统治者这种表面上的昏庸,正来自“家天下”(即以家族宗室为基础的个人集权)的理念和方术文化的流行。于是明代矿业的发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供皇帝修炼所需的原料,基本上由朝廷派宦官把持着,不可能以发展民间的产业和商业为目标。

^① 参见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26—27页。

邓拓、傅衣凌等人相当乐观地宣称,明代已形成了市民阶层,包括农村也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租佃关系。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样的结论值得推敲。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采用计量统计方法,通过对现存明清时期54卷地方官府的土地册和户册(大部分为鱼鳞册)、84卷私人户的购地记录、175卷收租记录及大量土地交易契约的普查与统计,发现来自安徽徽州、浙江衢州、严州、杭州及江西广信等地区的这些材料(只有三份地点无法确定)中,标明的相关土地面积都不大,足证当时普遍存在的是小土地所有制。而且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即土地周转率低,租佃关系稳定,即使佃户拖欠租谷,原来的租佃关系也继续保持着。^①这一计量统计方法比个别抽样方法更有说服力,证明江南这一地区,迟至清代,不但没有成规模的土地买卖与大土地集中的现象发生,并且地主与佃农的生产关系,也非市场经济性质,而继续是封建宗法性质的。在前一种情况下,租佃合约无法履行,租佃关系即遭解除,而后者订立租佃合约更像是建立一个人身附庸关系。在此起关键作用的仍是承袭千年的宗亲文化。

至于清代,所建立的是满族与汉族联合执政的权力结构,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汉文化的传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才稳定了统治的清朝廷,海禁、闭关、驱逐西方传教士等政策一沿其旧。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正式派出马戛尔尼为首的代表团来华,要求建立正式通商关系与租借领地,已经是被动地面对扩大国际贸易的局面了,但八十高龄的乾隆皇帝不准,断绝了同西方和平进行商贸的可能。此事近来报刊大小文章屡有提及。其实在此之前的乾隆二十年(1755),东印度公司的属员洪任辉为同一目的和清朝地方官员交涉不成后,由广州商馆来到北京上过书,同样遭朝廷拒绝,还被判处监禁三年,刑满后逐回英国。在入主中原后,按传统观念看来原属所谓“夷狄”之邦的满族统治者,也转而以中央大国自居,不能以平等态度考虑别的国家的通商要求,这不能不说是文化薰习之故。

大陆型文明制约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因素方面还有许多。如重农轻商,鄙视商业以为末流。又如不尚新奇,因而对发明创新不感兴趣。明末张潮曾将传教士南怀仁介绍世界七大奇迹的《七奇图志》连图带文辑入所撰《虞初新志》,却加按语说:“极西巧思独绝,然吾儒正以中庸为佳,无事争奇斗艳也。”(第19卷)就是个例证。同样很难想象,一个以海洋为生命线的国家,会动用装

^① 赵冈:《关于明清时期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材料》,英文版载《亚洲研究杂志》1981年8月号,中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5期。

备海军的款项,来修建为慈禧太后庆寿的皇家花园。概而言之,中国本土虽不无走向现代化的活力与契机,但一系列的文化特征限制了向产业化的跨越,导致产业革命迟迟无法发生。与此同时,中国在明代积蓄的大量白银,除了内耗之外,绝大多数通过不平等条约为各个殖民国家掠夺而去,被它们(尤其日本)用于发展本国的现代化。因此靠自然生长,不可能让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即使发生社会大变动,也不外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

(二)

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并非单方面的结果,但如果从内因、外力二元结构来分析,则应肯定,主要靠外力的冲击。正是这种冲击设立了文化上的“他者”,让中国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要走的路,所以外力在这里充当的是决定性的条件。当然,事物之变化还有内因另一条件,但它所起的功能,是在外力施加作用时,对事物将作出何种反应而做出的规定。所谓“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说法,绝不等于惟有内因才促成了事物的变化,这里需要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暂且先把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观的问题搁置一下,那么应承认,适用于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发端状况的,仍然是“冲击/回应”模式。不过单一的“冲击/回应”模式过于笼统或粗糙(这可以说是早一代西方汉学家的缺陷),必须看到即使同样的“冲击/回应”模式,也有更细致的差异情况。甚至在“冲击”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回应”仍可能各不相同。

这里试以日本为例简单做些比较。日本在空间上和中国相邻,如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作为现代化启动的标志,时间上也颇接近。而且其发端也有重大外来动因,即美国舰队的侵犯、美国及荷兰、德、英、法等国先后签订的不平等性质的通商条约等一系列外部事件。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觉,觉得日本是我国邻邦,同属东亚文化圈,发展现代化的道路应该差不多。但事实上,日本的文化属于不同系统,因此作出的就是另一种回应。

日本是个岛国,属于海洋型文明,本身资源无法自给自足,文化传统上一直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为特征,汉唐以来接受了从中国传过去的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近代又接受了西方传入的“兰学”(即中国所说的“西学”,因最早由荷兰传教士传授而得名)。因此受到外力冲击后,就顺应了这一外力,同样走上了殖民拓张与掠夺的道路。明治维新后日本曾投入力量开发北海道,想以北海道作为本国的农业基地和原材料供应地,结果因高寒的气候及其它原因而失败,接着日本就打起了朝鲜和我国东三省的主意。通过大力发展海军,发动甲午海战与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了清廷与沙俄,以侵略战争赢得了东亚的制海权,二战期间